核心靶子),深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重要论断,在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坚决有力批判中,捍卫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合法性。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2〕陈定学:《〈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原创吗?》,《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

〔3〕〔加〕齐慕实:《毛泽东与毛泽东研究的当代境遇及其展望——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齐慕实教授访谈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4〕卜宪群:《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琐谈》,《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5〕尚庆飞:《毛泽东晚年错误岂可归咎于“两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7日。

〔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8—299页。

〔7〕于沛:《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责任编辑:嘉　耀〕

“多元症候”探析及其批判路径构建〔*〕

——评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张　明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毛泽东研究中的“多元症候”之表现而言,可以从纵向历史性线索与横向逻辑性线索进行基本的界划分类,针对“多元症候”需要从多元维度进行批判。一方面必须实现政治与学术的双向结合,即正确的政治姿态是根本,但同时必须辅之以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在学术化的路径下展开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批判;另一方面必须实现史料与方法的有机结合,即全面占有毛泽东研究中的客观史料并进行科学运用构成了回应的直接方式,而拓展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视域并引介新的方法论资源构成了回应的间接支撑。

作者简介:张明(1987—),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问题意识、特色情结与理论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路径研究”(15MLC006)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科学批判；多元症候；学术与政治；史料与方法

毛泽东研究的深化与拓展需要以一种学术化的路径加以展开，需要将毛泽东视为一个客观的学术对象加以冷静审视。尽管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从本质上而言并非是所谓客观中立的学术性讨论，但是它以非学术、非严谨性方式虚无化毛泽东及其思想实践的操作方式，确实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规范化推进造成了严重阻碍，在此背景下所构筑的毛泽东思想肖像必将是一副经过人为撕裂、丑化过的漫画式形象。科学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的歪曲与否定，需要从根基上建构出一套科学的批判路径。科学批判路径的建立必须要有明确的针对性，需要全面把握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需要透过表层现象而直切问题的本质。只有建立在对“症候”科学而全面的诊断基础之上，方能真正建构出科学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正确批判路径。本文拟从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多元表现分析入手，寄希望通过对这一“症候”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病理解剖”，以建构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论路径。

一、“多元症候”：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形式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具有多种形式，并且它们所呈现的载体也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从传统媒介到新兴媒体。国内学界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形式已经进行了较多的论述，从整体上已经勾勒出了历史虚无主义自我兜售的形式、载体与内容。但是，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歪曲、丑化毛泽东及其思想实践？对这一问题相关研究并未给予充分的探讨与关注，对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大多是置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整体表现之中加以把握的，或者说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在现有学术探讨之中更多地是作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小分支而加以进行的。就笔者接触的有限资料而言，对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表现进行集中分析探讨的著述并不多见，在现有的几篇集中解读性文章中，相关研究视角也主要聚焦于对历史虚无主义表现的直接反应之上，即更多地是将目前学界出现的虚无主义毛泽东的现象进行大致的罗列，诸如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夸大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在毛泽东私人生活上进行丑化，等等。尽管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指正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毛泽东研究中的表现，但上述概括主要是停留在现象层面的经验描述，并且更多地是跟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尾巴”而动，缺乏积极主动地介入到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毛泽东研究中表现的透视之中。换言之，科学透视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不能仅仅停留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呈现的“直接证据”，而需要深入到这一错误思潮的内在逻辑层面并进行一种总体性的概括。笔者以为，科学透视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可以从历史性与逻辑性双重维度出发。具体而言：

所谓历史性线索,即是按照毛泽东生平、思想发展的历史主线进行基本界划。从这个维度而言,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主要针对如下几段历史时期与历史事件进行集中攻击与否定。一是民主革命时期,尤其是延安整风时期。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在早年毛泽东问题上不予以关注,其主要原因在于早期毛泽东并未成为党的领袖与中国革命的化身,对此一阶段毛泽东的"关注"无法服务于历史虚无主义特定的政治诉求。而民主革命时期,尤其是在延安整风阶段,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袖,他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象征地位在不断增强的趋势中得到确立。因此,对此阶段毛泽东的攻击与否定无疑正契合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价值考量,所谓延安整风"阴谋论""权力斗争论"等虚无主义观点也开始不断呈现。为服务于上述论点,大部分史料都是通过人为选择、包装之后加以拼凑、整合的产物。二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关于毛泽东领导"三大改造"的认识。历史虚无主义从根基上否定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合法性,因而首当其冲地便是否定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一些论点对"三大改造"展开了集中攻击,尤其是对"三大改造"中所出现的偏差与不足(这些都是支流)进行了夸大化处理,从而寄希望从根本上否定"三大改造"的历史意义。并且,这一观点还明确将毛泽东时代"三大改造"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对比,以所谓"补课论"的观点来否定"三大改造"的合理性。三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毛泽东晚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性实践。历史虚无主义对这一历史阶段的攻击与否定,主要聚焦于如下三大历史事件: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因为从直接显性层面而言,上述事件代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性实践的失误与曲折。尽管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上述历史事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判,对其中的绝大部分进行了否定,但这种否定与历史虚无主义意义上的否定存在着本质性差异。历史虚无主义对上述历史实践否定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上述历史实践的否定达到对上述历史阶段的整体性否定——全盘否定,并进而实现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否定。

所谓横向逻辑性线索,即是从毛泽东思想理论、实践的内在逻辑结构出发进行基本的界划。从这个维度而言,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中的表现,可以大致划分为理论基础与理论定位两个方面。第一,从理论基础层面而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集中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性维度。毛泽东思想理论最为核心的代表即是毛泽东思想或者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代表。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以来都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作为"结合"的产物而存在的,它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又彰显了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性。作为毛泽东思想在理论根基上的代表——实事求是思想原则,其主要文本载体是毛泽东于延安时期创作的"两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此问题上,以所谓学术面貌加以"出场"——攻击"两论"是对苏联教科书的简单翻版与抄袭,因而在理论上不存在任何创新之可能。第二,从理论定位层面而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抹杀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与意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已经由既往实践所证明，尽管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存在着曲折与失误，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始终是作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而保留下来。正如邓小平所言，“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1] 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将毛泽东思想置于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同等地位——作为基础理论而加以坚持。然而，这一正确的理论判断在历史虚无主义那里却又成为了攻击、否定毛泽东的口实。他们错误地认为，既然党的官方文件表述中已经将毛泽东思想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时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绝对割裂甚至是对立的关系，甚至以改革开放后 30 年历史成就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的论述也层出不穷。依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而言，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已然不具有任何指导性意义，当前中国所进行的伟大实践根本上是与毛泽东时代是相对立的。这一判断不仅是对毛泽东思想地位的歪曲，同时也是对当前伟大实践的曲解，因为当前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尽管在许多方面与毛泽东时代存在着差异性，但从“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宝贵经验”等维度而言，上述两个时代存在着不容割裂的紧密关联。有学者明确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 30 年之间的衔接关系概括为“两条明线”（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时代提供的物质基础、理论准备）与“一根暗线”（毛泽东晚年探索的失误，通过对错误经验的总结变成指导当前实践开展的宝贵财富）。[2] 正是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这个问题上的攻击与歪曲，习近平总书记在执政伊始就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 30 年之间“不能相互否定”的重要论断。[3]

二、从政治到学术：建构批判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基本原则

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在毛泽东研究中的泛滥，主要是通过学术幌子的精心伪装而“出场”，其深刻折射了在如何认识历史、如何评判当下、如何展望未来的重大政治问题上的不良政治意图。因此，切实可行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毛泽东研究中的泛滥，必须实现政治与学术的双向结合，即正确的政治姿态是根本，但同时必须辅之以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在学术化的路径下展开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批判。具体而言：

一方面，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与严肃的理论使命，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的歪曲与否定。如前所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毛泽东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否定作为个体性存在的毛泽东，而关键在于通过否定毛泽东以实现对中国近现代以来革命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史（包含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全盘否定与消解。目前国内学界愈发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并逐渐形成一种共识性判断，即“它从根本上讲就不是一种学术思潮，而是一种反动的政治思潮。其所反映的也不是历史问

题或文化问题,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问题。”[4]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对毛泽东的歪曲与否定,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亦或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从根本上无从脱离与毛泽东时代的密切关联)的普通民众,他们无论是基于纯粹的学术使命、政治责任亦或是民族情感,必须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保持高度的警惕,坚决维护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地位、坚决拒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妖魔化、歪曲化与否定化风向。因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并非是由以往时代或当前时代某个集团或某个个人所人为设定的产物,而是经过历史发展的长河所反复检验过的,从根本上是由历史以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所共同决定的“合力”。这种基于历史发展普遍意志所形塑的历史性痕迹——毛泽东的影响及其地位,也是任何力量所无从抹杀的,因为这是由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趋向所决定的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规律的产物。因此,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的攻击,决不能采取“局外人”的观望态度,因为毛泽东及其影响并非随着他个体生命的消逝而消失,它仍然对当代中国以及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显性或隐性影响。任由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在毛泽东研究上泛滥,其实是从根本上放弃了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解释权与发言权。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操作,在根本上剥夺了中国大多数民众言说的权力,否认了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以及其为后毛泽东时代发展所发挥的奠基性作用,误导、剥离和排斥了对人类发展另类模式以及其它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想象空间。[5]

另一方面,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中介,在对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深入研究中,以严谨的学术化路径积极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的攻击。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的否定,仅凭高昂的政治热情并不够,因为运用抽象的政治标签或政治训话进行的所谓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驳倒历史虚无主义。诸如,历史虚无主义攻击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基础的“两论”是抄袭,仅仅从所谓政治性宣言——“两论”并非是抄袭而是毛泽东的原创,等等——并不能从根本上驳倒历史虚无主义。相反,必须要通过学术化路径的分析,即阐释毛泽东“两论”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保持了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相承性,又在何种意义上呈现出特定的断裂性或理论创造性,这才是科学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正确理论路径。倘若仅仅运用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亦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标签进行喊话,那么这种所谓的理论批判仍然停留于抽象的批评,而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历史虚无主义的根基。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在学术化路径下真正做实毛泽东研究,真正通过具体的历史的研究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责难点,因为只有在扎实而严谨的学术成果面前才能真正揭露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的本来面貌。

三、从史料到方法:建构批判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具体路径

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毛泽东研究中的多元表现,需要针对不同症状开处不同药方。从政治到学术的多元互动仅仅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路径,在具体操作层面,尚需要实现史料与方法的具体有机结合。具体而言:

一方面，全面占有毛泽东研究中的客观史料并进行科学运用，构成了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直接方式。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攻击、否定毛泽东的具体操作中，存在一个固定化的路径便是史料运用上的碎片化、随意性乃至伪造性。史料的选择、应用都是在先在所设定的理论旨趣指引下进行加工、编排与整理，直接服务于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毛泽东的目的。因此，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毛泽东歪曲与否定最为便捷的方式就是运用史料进行说话。诸如，反驳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问题（即前一段时间流传的《毛泽东选集》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并非出自毛泽东本人之手），其中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将带有毛泽东笔迹的原始史料公布于众，齐得平先生的反驳文章正是这一回应方式的集中体现。[6] 就毛泽东研究而言，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赖以支撑的史料与文本资源，应当实现多元化的转型：即不仅局限于毛泽东本人的文本资源，而且需要扩展到毛泽东同时代党的领导人文本资源、中共党史史料等多重维度；不仅局限于文献资料等有形文本，而且应当实现向无形文本的扩展，诸如毛泽东及其时代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毛泽东时代的口述历史等非物质性文本。并且，就毛泽东本人的文本资源而言，笔者倾向于进行基本的分类界划，并在研究中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对待与应用。诸如，早期非马克思主义阶段的文本不能超越历史限制而采取无差别地任意运用、对于具有完整逻辑结构的正式文本、非完整逻辑结构的生成性文本与读书笔记之类的“拟文本”，它们在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过程所具有的地位应当进行具体的区分。[7]

另一方面，拓展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视域并引介新的方法论资源，构成了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间接支撑。运用客观史料进行回应是一种便捷的方式，但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又是多元的，针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仅仅依赖史料回应在逻辑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诸如，革命战争年代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一些史料的保存与流传存在着困难，甚至造成了史料学意义上的缺场。再如，就一些问题的讨论而言——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仅仅依据客观史料并不能从逻辑上驳倒历史虚无主义。因为此时倘若拘泥于人口死亡具体数字的史料之争，其实在逻辑上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所预设的陷阱之中，因为即使是极少数人口的死亡也是非常深刻与惨痛的教训。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引入方法论层面的资源，以实现与文本史料的配合。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面对同一文本，在不同方法框架下完全可能达到截然不同的理论景观。诸如，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对毛泽东所谓“两论”抄袭的攻击，在形式层面大量不可避免存在的话语表达方式及其概念使用上的雷同性面前，单纯运用文献史料回应的方式似乎呈现出力不从心的尴尬，从方法论视角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不失为一种理论上更深刻的途径。从方法层面而言，“两论”与塑料教科书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问题式”——存在于表面文本的深层逻辑构架之中，因此，用“直接阅读”方法是不可能读出这一实质性问题所在，因而需要引入“症候阅读”方法，读出文本背后的隐性逻辑构架。法国理论家阿尔

都塞正是在此意义上，从《矛盾论》中读出了“多元决定论”的理论构型。[8]

概言之，对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需要从对其具体表现的分析加以入手，从对其存在的多元症候之诊断中建构出科学的批判路径，即从政治向学术、从史料向方法的多元转型。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00 页。

〔2〕刘林元：《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毛泽东的历史遗产》，《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第 6 期。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11—114 页。

〔4〕钟社文：《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 9 月 21 日。

〔5〕Mobo Gao, 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p.2.

〔6〕齐得平：《我所了解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档案和手稿情况——兼驳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党的文献》2012 年第 2 期。

〔7〕张明：《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学分类方法与意义》，《南京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 期。

〔8〕〔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213 页。

〔责任编辑：嘉　耀〕

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认识论“症结”〔*〕

○ 韩步江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彻底否定或改变人们既定认识的极端思潮，渗透到毛泽东研究领域，无疑是对毛泽东研究者的一种挑战。从认识论层面上，深入剖析历史虚无主义渗入毛泽东研究中的原因、过程和抵制措施可以发现，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中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认识论“症结”，用局部认识取代整体认识，用“虚无”认识取消既定认识，背后昭示出的是，“虚无”本身也是一种“虚无”，以“虚无的理论本真诉求”代替历史既定的本真认识，表面上看是主体对客体能动反映的表现，实质上是完全放弃历史唯物主义、丢弃反映客体的维度，片面发展认识能动作用的唯心主义，并不能

作者简介：韩步江(1981—)，博士，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研究。

〔*〕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毛泽东实践概念及其意义研究”(13ZXC013)的阶段性成果。